两半斋 读书记

从秦始皇刻石说起

俞晓群
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写道:“秦始皇帝者,秦庄襄王子也。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,见吕不韦姬,悦而取之,生始皇。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郸。及生,名为政,姓赵氏。”秦始皇13岁时,庄襄王死,政代立为秦王。在位26年后实现一统天下,称始皇帝。

此后在位11年间,秦始皇表现出两大“喜好”:

一是喜好巡游天下,自在位27年至37年去世止,秦始皇平均每一两年即出行一次,共出行5次(一说6次)。其中,第一次巡行陇西、北地,第二次东巡郡县、登泰山封禅,第三次再巡东方,第四次巡行北方边地,第五次南巡云梦、会稽,返程途中病死于沙丘。

二是喜好在巡游途中不断留下记录功德政绩的刻石,《史记》共记有7处,即:邹峄山刻石、泰山刻石、琅琊(琅邪)刻石、之罘刻石二刻、碣石刻石、会稽刻石,史称“秦七刻石”。

本文仅围绕秦刻石文化,略谈几个问题。

刻石文化的起源

饶宗颐说:“石刻的发展,与秦地文化似乎很有密切的关系。《管子》称:‘封于泰山七十有二家。’其铭刻今不可见。降而下之,商时有磬上刻永祃、永余、天余等铭字,这是刻于乐器上的。现在所知战国刻石,以秦地最为盛行。计有石鼓及《诅楚文》和秦始皇时在峄山、泰山、琅琊、芝罘、碣石等刻石。《秦本纪》记纣时,秦之先世蜚廉为坛霍太山,得石棺,铭曰‘帝令处父(《索隐》:处父,蜚廉别号),不与殷乱。赐而石棺以华氏。’而秦蜀守李冰立碑有‘深陶潭,潜包隅’句(张澍《蜀典》引金石文)。秦昭襄王与巴刻石为盟(《华阳国志》一),可惜这些石刻已是失传,但由于秦地石刻的丰富,可见刻石的风气是秦人加以发展的。”(《论战国文学》)

饶宗颐文中提到的几段秦地刻石的故事,此处略加补充:

一是石鼓,马衡《石鼓为秦刻石考》写道:“石鼓为吾国石刻中之最古者,为刻石,为碣,而自唐宋以来多称之曰石鼓,名之不正也久矣。”

二是《诅楚文》,它是战国后期秦国刻写的三篇告神石刻。北宋时出土,苏轼曾作诗《诅楚文》,序文写道:“碑获于开元寺土下,今在太守便厅。秦穆公葬于雍橐泉祈年观下,今墓在开元寺之东南数十步,则寺岂祈年之故基耶?淮南王迁于蜀,至雍,道病卒,则雍非长安,此乃古雍也。”

三是秦昭襄王与巴刻石为盟,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记道:“秦昭襄王时,白虎为害,自秦、蜀、巴、汉患之。秦王乃重募国中:有能煞虎者,邑万家,金帛称之。”夷人杀虎,“欲如约,王嫌其夷人,乃刻石为盟要……盟曰:秦犯夷,输黄龙一双;夷犯秦,输清酒一钟。”

四是秦蜀守李冰立碑故事,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记道:李冰事秦昭王为蜀守,“于玉女房下白少邮作三石人,立三水中。与江神要:水竭不见足,盛不没肩。”

司马迁笔下的黔首刻石

《太史公书》记载秦始皇巡游刻石,歌功颂德的文字颇为丰富,最为后人看重。其实司马迁对秦朝文化的记载是全方位的,他不但关注皇权下彰显的官方著录,还对天地鬼神的表象、世间众生的烟火、民间传说的寓意等,都刻意留下不少笔墨篇章。比如他在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中,不但记载皇帝刻石,还记载了“黔首刻石”等故事:“三十六年,荧惑守心。有坠星下东郡,至地为石,黔首或刻其石曰‘始皇帝死而地分’。始皇闻之,遣御史逐问,莫服,尽取石旁居人诛之,因燔销其石。始皇不乐,使博士为《仙真人诗》,及行所游天下,传令乐人歌弦之。秋,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,有人持璧遮使者曰:‘为吾遗滈池君。’因言曰:‘今年祖龙死。’使者问其故,因忽不见,置其璧去。使者奉璧具以闻。始皇默然良久,曰:‘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。’退言曰:‘祖龙者,人之先也。’使御府视璧,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。于是始皇卜之,卦得游徙吉。迁北河榆中三万家。拜爵一级。”

这段故事中提到,秦始皇将死之年,天地之间出现的四件诡异现象:一是“荧惑守心”,二是有持璧者说“今年祖龙死”,三是“天降陨石”,四是陨石上被人刻字。其中第四项即“黔首刻石”的故事,其内容最为残酷。所谓黔首即平民百姓,意思是说,秦始皇三十六年时,有流星坠落到地上化为陨石,可能有百姓在上面刻字曰:“始皇帝死而地分”。秦始皇找不到刻石者,就把居住在落石附近的人都杀了,并将石头焚毁。

《汉书》补论秦石载记

司马迁之后,班固又推进一步,他在撰写《汉书》时,不但保留了司马迁的笔下故事,还接续《史记》八书的内容,在《汉书》中建立了《天文志》《律历志》等十志,其中有些志书如《五行志》是班固新创。《汉书·五行志》的创立,为刻石、刻碑一类故事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历史空间,那就是按照五行类分,确定他们在正史、野史、笔记中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。

班固在志书中不仅补写了纪传中未尽之言,还给出了史官的评语。

比如上面那4个“故事”,班固将其分门别类,深入分析,把“天象”归于《天文志》,其余者归于《五行志》。而“黔首刻字”见于《汉书·五行志》白眚白祥,他写道:“史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,郑客从关东来,至华阴,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,知其非人,道住止而待之。遂至,持璧与客曰:‘为我遗镐池君。’因言‘今年祖龙死’。忽不见,郑客奉璧,即始皇二十八年过江所湛璧也。与周子鼋同应。是岁,石陨于东郡,民或刻其石曰:‘始皇死而地分’。此皆白祥,炕阳暴虐,号令不从,孤阳独治,群阴不附之所致也。一曰,石,阴类也,阴持高节,臣将危君,赵高、李斯之象也。始皇不畏戒自省,反夷灭其旁民,而燔烧其石。是岁始皇死,后三年而秦灭。”

历代文献中的刻石

■《三国志·明帝本纪》

《汉晋春秋》曰:氐池县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,其声如雷,晓而有苍石立水中,长一丈六尺,高八尺,白石画之,为十三马,一牛,一鸟,八卦玉玦之象,皆隆起,其文曰“大讨曹,适水中,甲寅。”

■《南齐书·祥瑞志》

会稽剡县刻石山,相传为名,不知文字所在。石上有文凡三处。大石文曰:“此齐者,黄公之化气也。”立石文曰:“黄天星,姓萧字某甲,得贤帅,天下太平。”小石文曰:“刻石者谁?会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封也。”

■《隋书·五行志》

大业十三年,西平郡有石,文曰:“天子立千年。”百僚称贺。有识者尤之曰:“千年万岁者,身后之意也。今称立千年者,祸在非远。”

■《宋史·五行志》

周广顺初,江南伏龟山圮,得石函,长二尺,广八寸,中有铁铭,云:“维天监十四年秋八月,葬宝公于是。”

■《宋史·五行志》

建炎三年四月,鼎州桃源洞大水,巨石随流而下,有文曰:“无为大道,天知人情;无为窈冥,神见人形。心言意语,鬼闻人声;犯禁满盈,地收人魂。”

■《明史·五行志》

成都东门外镇江桥回澜塔,万历中布政余一龙所修也。张献忠破蜀毁之,穿地取砖,得古碑。上有篆书云:“修塔余一龙,拆塔张献忠。岁逢甲乙丙,此地血流红。妖运终川北,毒气播川东。吹箫不用竹,一箭贯当胸。汉元兴元年,丞相诸葛孔明记。”

■《清史稿·灾异志》

康熙十四年,藩王尚可喜于粤秀山筑垒,土中得一石碑,其碑文云:“抱破老龙伤粤秀,八风吹箭入陀城,种柳昔年曾有恨,看花今日岂无情?残花已自伤零落,折柳何须关废兴,可怜野鬼黄沙迹,直待刘终班马鸣。”

■链接

浅谈刻石文化历史

刻石文化的产生

“刻石之风流衍于秦汉之世,而极盛于后汉。逮至魏晋,屡申刻石之禁,至南北朝而不改。隋唐承北朝之遗风,事无巨细,多刻石以记之。自是以后,又复大盛,于是石刻文字几遍中国矣。”

刻石与刻碑的区别

“今人谓文之载于石者皆曰碑,其实不然。刻碑之兴,当在汉季,古只谓之刻石。”也就是说,把文字刻写在石头上,汉代以上称刻石,汉代时才有了碑的称谓。

刻石形式的细分

“刻石之特立者谓之碣,天然者谓之摩厓。”也就是说,把石头立起来刻写称作碣,在天然处置的石头上刻写称作摩厓,即“摩厓者刻于崖壁者也,故曰天然之石。”《史记》中记载的七处刻石,有六处被称为“立石”,“唯有碣石一刻曰刻碣石门,不云立石,疑即摩厓。”

刻碑的由来

“碑为庙门墓所所用,然则用以刻辞,果始自何时?曰,始于东汉之初,而盛于桓灵之际,观宋以来之所著录者可知矣。”

——摘自马衡《凡将斋金石丛稿》

书市观澜

弱悬疑成作品破圈入口

姚雪痕

近期,根据班宇小说《于洪》改编的短剧《余红旧事》,在爱奇艺迷雾剧场热播。王佳佳、张哲华一开口,满屏东北味儿,连台词都带着东北地域特有的烟火气,被网友调侃“鞍山DNA动了”。

剧集带火的,不只是班宇和他的小说,这也并非原著改编的常规联动,而是以“影视引流-图书承接-题材扩散”传播链路,将热度传导至风格相近的其他作品。一批新出版的文学读物同步升温,《北方情侣》《活在真空里》等纷纷被读者圈定、下单。

这一现象背后遵循的逻辑是:读者买的并非是单一IP,而是“题材+情绪”。《活在真空里》就是典型的例子。这部被冠以“知乎三绝”的口碑作品,上线前已积累超200万读者讨论、近80万高赞,电影、网络剧已在开发制作中。它写的是普通人追索陈年旧案,记忆反复翻转、真假难辨,重点不在破案,而在人如何背负过往活下去。这与《余红旧事》的“悬疑吸睛+小镇日常”形成同频。读者被剧集唤起的是“记忆迷雾、平民生活、克制叙述”这一整套情绪,随后顺着题材而非具体书名涌向书架。

前些年,伴随着“铁西三剑客”走进大众视野,东北文学成为图书市场热点,带给读者的不只是冰封萧瑟的地域景观、鲜活的方言对白,还有裹挟着时代记忆的工厂怀旧。如今,地域文学热潮退去,范式内化为普适叙事。今年这批新书明显地去地域化,不再依赖特定的地域符号制造氛围,而是把“记忆迷雾、平民生活、克制叙述”这套成熟的叙事范式,移植到全国不同地域。在《余红旧事》里,东北味儿只是容器,核心是广场居民共通的生存现状;《北方情侣》里,北漂的破碎关系剥离了地域标签,落点是不同地域读者均能共情的中年困境。数据表明,读者更愿意按“题材+情绪”而非按地域检索,说明市场正从消费地域文化,转向消费共通精神处境。

出版界目前已形成共识,严肃文学与类型叙事融合,“弱悬疑+心理现实主义”成为热门选题。在作品中嵌入一桩悬而未决的往事,更容易吸引读者,同时保留了文学深度。弱悬疑因此成为作品破圈的第一入口,出版社在选题阶段便兼顾文学价值与影视转化空间。这批热销图书并非推理小说,却普遍借用悬疑、旧案、秘密作外壳,承载纯文学的心理与时代反思——悬疑是钩子,人性与记忆才是内核。《活在真空里》如此,雷米《除恶》、贝客邦《海葵》(改编电影《消失的人》票房近3亿元)亦同此理。

可以说,《余红旧事》掀起的这波热度,为出版选题策划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参照。面对“弱悬疑+心理现实主义”这条赛道,出版社在策划选题时,需要同时回答三个问题:有没有文学文本价值?能不能引发全民共情?是否具备影像转化的想象力?

文本价值决定作品能否经受文学评价,形成长期口碑;全民共情考验故事能否跳出地域局限,以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触动广泛读者;影像转化想象力则评判叙事、留白与人物秘密,是否适合跨媒介传播。三者平衡,方能抓住影视热度外溢带来的市场窗口,实现口碑与销量双向落地。

■荐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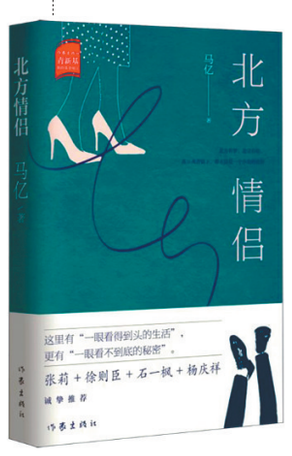
《此时此刻》
花城出版社
浙江文艺出版社

一部以江浙地域为叙事场域,观照中年人生起落的长篇作品。小说讲述了主人公艾胜春突陷命运低谷,财富清零、众叛亲离之后,直面现实,在得失之间拆解自我认知,积极重建生活秩序并最终找回失散的友谊和爱情,重建与世界的联结,并确立自我的过程。



《活在真空里》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全书以南方小城为背景,采用弱悬疑的叙事架构。一桩看似证据确凿的旧案不断翻供,三次翻供、层层反转,作者不执着于追求破案爽感,而是借案件叩问人性,描写普通人深陷往事、自我遮蔽的困境。作品将弱悬疑与心理现实主义相结合,书写个体生存状态,具备较强跨媒介想象空间。



《北方情侣》
作家出版社

90后作家马亿短篇小说集。小说褪去地域标签,聚焦租房、失业、情感破裂等现实处境,书写北漂群体的日常。故事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,重在讲述亲密关系里难以弥合的隔阂,个体在都市漂泊中的孤独与失根。作品延续心理现实主义的叙事路径,用平静的文字挖掘当代青年共通的精神困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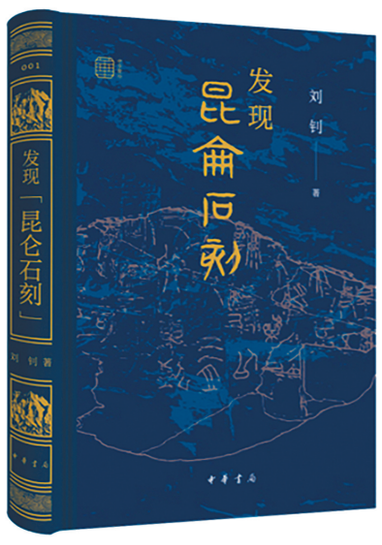
一块千年石刻的文化探寻

陈 裕

■提示

2025年6月8日,一块藏在青海扎陵湖畔的37字秦代摩崖石刻被公之于众,由此引发了学界的诸多讨论。这块石刻的历史谜题中,包含了昆仑到底在哪儿、“采药”是不是秦始皇求仙的证据等诸多真相有待挖掘。

复旦大学刘钊教授立足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的专业视野,运用金石学、古文字学的专业考据手段,撰写了《发现昆仑石刻》一书。深入考证这块石刻背后的历史事实,从刀法、字体、历日、文本性质等9个维度,层层剥茧,通过缜密的文献与实物比对推理,撰成这部石刻专题研究著作,厘清并解答了围绕该石刻的一系列历史谜团。



> 刘钊创作本书的过程不仅是一次抽丝剥茧的求真之旅,更是一场贯通文字、考古、金石、史学的“探源之行”。他立足实物遗存与文献记载,多维度审慎考辨,在破解石刻谜团的同时,梳理古代文字流变与镌刻传统,带领读者窥见早期历史鲜活的细节。

本书并非简单的考古报告,而是一场揭秘古代文化、古代哲学思想,古代人文境变的理论定调之旅,也是目前第一部系统解读“昆仑石刻”的学术专著 。

全书共分6个章节,作者刘钊通过广搜文献,拆解字形,辨析文意等途径,进一步论证石刻本貌,力求还原秦代的历史面貌。

刘钊从多个维度对石刻进行了系统性论证。在每个篇章中,秉承严肃的治学之本,引用多方文献古籍,修正官方释文。他在书中指出官方释文存在瑕疵,例如铭文中应为“藥”(药)字而非“樂”(乐)字;“五大夫”3字应直接释出等等,纠正了过往人们对历史文献的个别误判,为历史文化的推演起到了扶正的作用。

对于学术上的历日争端,作者给出了清晰的解答。如最初摹本中“廿六”与秦始皇历日不合的认知,刘钊通过高清照片确认实为“卅七”之误摹,并与里耶秦简中的字形进行直观对比,化解了历日矛盾 。由此所带来的历史遗存问题,得到了明晰的解决,为他人深入研究秦时历史文化提供了借鉴。

> 针对学界围绕石刻字体形态、刊刻技法提出的相关质疑,刘钊依托古文字字形演变脉络与古代金石镌刻工艺史料,结合石刻实物字口、刀痕细节逐一辨析,以实物证据与出土文献互证的方式作出系统性回应。

有人认为昆仑石刻字体是小篆,甚至有人说是玉箸篆。刘钊将昆仑石刻上的文字,与已发现的、时间确切的其他秦代文字作了比对,认为其字体是典型的秦篆。昆仑石刻的文字从结构到体势,跟进行比较的秦文字都极其相像。

值得一提的是,石刻中的“翳”字是一个新见字,此前从未在任何秦代文字材料中出现过。关于“皇”字写法是否规范的疑问,刘钊以龙岗秦简等实物证明,秦代文字存在“官方规范与民间实践并行”的现象,非诏书类文书未必严格执行字形规定。

> 通过多维度证据链论证“昆仑石刻”的真实性,依托石刻文字、刊刻特征与传世典籍相互参证,刘钊把秦始皇晚年遣使入海采药这一历来归于文献传说的记载,落实为可信的史实,为秦代方术史与帝王求仙活动研究增添珍贵实物依据。

这一论断说明,以昆仑为象征的信仰与追求,并非后世假想,而是当时的一种哲学实践。它反映出战国至秦时期,道家思想超越现实、阴阳五行与国家集权的融合,也印证着帝王对“天命”与“生死”这类哲学命题的探寻与求索,为研究历史中的人文变化提供了史料基础。

昆仑地域概念在古代中国代表着宇宙观与生命哲学,它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,更是一种精神象征。本书对古昆仑认知范畴的证实,既说明秦始皇派人西至黄河采药的确凿性,又侧面验证了古代君权神授的固有认知思想。书中结合里耶秦简等史料指出,秦始皇晚年因“荧惑守心”等天象与自身疾病,陷入对天命将终的深刻恐惧。试图通过“采药”“变气易命”来超越天命。这一行为是皇权体系与生命哲学冲突的表现,诠释古代最高统治者面对终极哲学问题时的迷茫和困惑。

作为历史文化的学术专家,刘钊在《发现昆仑石刻》这本书中把古文字学、金石学、历史地理学等硬核知识讲得通俗易懂。书中阐述的学问严谨而浅显,哪怕你对考古一窍不通,也能跟着他的思路,学会“怎么看证据”“怎么辨真伪”。这样的写作手法,体现了作者过硬的历史知识和文学功力。

《发现昆仑石刻》这本书终结了人们对一块千年石头的众说纷纭,它不仅为“昆仑石刻”验明了正身,让“昆仑”这一地域所代表的哲学思想拥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论基础,而且体现了作者的治学风范。像刘钊这样的学者执着于对历史文化的追寻,皆是因为千年前诞生繁杂历史事件的华夏大地,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源头,这其中不仅是对古代有关王权与生命思想的深度挖掘,更蕴藏着深厚的家国情怀。